

第一章 威尔逊的遗产

美国是在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而美国一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采取了一个极具当代意识的举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周，当豪斯上校代表威尔逊游说欧洲旧大陆各国政府时，他没有陷入裁军的空想，而是建议欧洲各大国限制军备。此举已显示出今日“军备控制”谈判的求实精神。当时美国政府的目的，已经是使有关国家的元首觉悟到军备持续增长带来的危险，并通过建立暗中的交流渠道，扩大谈判的范围……

两年后提出的威尔逊计划就更加完善了：该计划旨在将美国国内的宪政机制搬到国际领域，创立一种国际社会的法治状态。1916年5月27日，威尔逊提出了他的和平计划。这一计划表明，美国决心建立“反对任何自私的侵略的公理的至上权力”，并用“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签订的共同协定”取代“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旧式外交。当美国参战时，威尔逊在1917年4月2日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

美国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均势”，一种“为参战国眼前目标和利益”服务的和平，而是要使一种“建立在对人类心灵与良知的呼唤的确切理解基础上的，新的国际法观念取得胜利。后来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确实与英国和法国的计划有很大区别，这两个国家的计划的中心，是建立一个欧洲安全同盟，亦即建立一个强化传统的均势外交的战胜国的联盟。

但是，法治能否立即得到确保，能否通过一纸文书取代传统的外交体系呢？威尔逊假设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他确信，通过这场战争，出现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他排除了使用武力捍卫公理的必要性：有国际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国联成员所承担的义务的影响，就足够了。实际上，利益和力量的博弈没有结束：按照莫里斯·布尔坎的说法，国际联盟这个雄心勃勃的法律和政治构架，不久就显得只是一种“悬在空中的准则的儿戏”罢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行动是与威尔逊主义一脉相承的。这位美国总统对和平恢复后的时代有着宏伟的蓝图，他是一个新的国际集体安全组织的设计者，也是一种通过让苏联重新参加进来、从而超越 1917 年的大决裂的国际体系的预言家，但当时，他却忽视了具体领土

问题的解决和苏联在东欧的挺进……联合国的缔造者们确实试图弥补国际联盟的不足，就像波恩的基本法的起草者将竭力改正魏玛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一样。国际联盟条约曾认为，力量对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45年，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一种真正的集体警察管理的基础。五大国督政府成为旧金山建立的机制的核心：大国被要求向这个世界组织提供足够的军事力量，使之得以履行其义务。

然而，由于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严重分裂，原先由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体系未能问世。此后继续存在的，只是一个在国家主权和国家管辖权的排他性方面可与国联相比拟的结构。但美国却逐渐习惯于这种国际议会游戏，它通过提出“联合维护和平”提案，真正改变了联合国机构间的平衡，使联合国大会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因为它认为，自己在大会中拥有自动的多数。这样就进入了一个世界范围的议会制度、或可称之为“议会外交”的时代，后来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就将议会外交作为自己的理论。

美国舆论开始抛弃先前国际宪政的理想，或者毋宁说，它又信奉起早年康德只让“共和政体”国家加入他所设想的“国家联盟”^[1]的理论来。看来，国际社会只有在完全由开明的民主国家组成时，才能接受法治……

由于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政治阶层和舆论转而寄希望于西欧和大西洋的宏大的法律、政治构筑。真正的国际共同体是大西洋联盟——尽管这违背了诅咒单独结盟的威尔逊的意愿！但是，威尔逊主义的精神还是被保全下来：西方的这个联盟，与十九世纪的秘密外交、均势权谋和形形色色的逆向联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构成希腊世界的城邦同盟一样，大西洋联盟和华沙的反联盟，构成了整个“雅尔塔时代”的国际社会结构。因此当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欢呼自由人民的联合成功地实现了“遏制”时，他可以宣称是照威尔逊的榜样行事。而当法国退出大西洋一体化军事组织后，约翰逊总统在 1966 年 3 月致戴高乐将军的信中把北大西洋公约比作美国宪法，也是奉行了威尔逊主义而不自知。

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若不完全排除道义的考虑，也趋于减弱这方面的考虑。欧洲的“现实政治”有时似乎也成功地嫁接到了美国。当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曾指使他的法学家们为他征服西西里岛寻找理由。雷蒙·阿隆指出 约翰·肯尼迪在 1962 年导弹事件危机中也是这么做的：他听任国务院的法学家们对“封锁”古巴作出表面上合法的解释。

是美国的外交进程突然发生了转变？是美国承

认了国家力量的基本作用？还是美国转而赞成政治现实主义和“单方面的”行动。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威尔逊所看重的“传教外交”，是美国想要传播的福音（单边主义、平等主义、法治）……而这种福音恰好可以与美国的特殊利益相吻合。美国的外交，即使在它单边主义最盛行时，也是戴着假面具的。它要考虑到国际机构的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中活动。它试图在策略上利用集体安全机制。它服从集体警察的表面上的纪律。

从 1969 年起，美国在尼克松总统任下，似乎要迈出从操纵在旧金山建立的安全体系到在重大问题——与两个超级大国有关的问题——上拒绝按联合国宪章行事这一步。对国际生活的法律规范的怀疑态度在增长。1970 年 4 月 25 日 罗杰斯国务卿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上，就表明了这种怀疑：“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国际法律秩序，即使是经过重组的国际法律秩序，都不可能对大多数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重大冲突的解决提供便利。”因此，现时所需要的，就不再是法律程序，而是力量均势了，希望就不在于尊重法治，而在于大国赞同一项共同的法统原则和恢复某种国际的协商一致了。用大国协商来取代集体安全机制的做法，在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的行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七十年代，共和党政府提出了所谓“和平结构”的主张。从国际会议到首脑会晤，向十九世纪外交的回复——有人把赫尔辛基会议比作维也纳会议，多次举行的首脑会议也确与“欧洲协调”时代的定期会议不无相同之处——有助于平息大国的纠纷和小国的喧闹。

这是否意味着开始了一个在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基辛格格式的现实政治之间——亦即在国际共同体和大国协调、国际法治状态和势力均衡之间——形成某种混合的时代呢？福特和基辛格政府期间，国际社会正经受 1973 年十月战争和使用石油武器造成的震动，均势模式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显示出其局限性；从越南到安哥拉，第三世界似乎向苏联的举动打开了大门，面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边缘地带取得的进展，被美国国会剥夺了开战权力的衰弱的美国政府一筹莫展。此后 杰米·卡特的外交缺乏内在的连续性，又使道德理想主义失去了信誉，这种理论只剩下了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即成了一种既无全球战略目标、又无政治意愿的空话。相反，里根时代的“单方面”外交政策，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真正的恢复。美国有了新的战略选择，它对同苏联进行的成为礼仪性的对话表示冷淡，同时，却采取了一系列单边或双边的举动 著名的‘战略防御

倡议”（其好处在于恢复美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其风险则是由于在大西洋联盟内部造成了两种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引起了盟友新的不安），对中美洲局势演变的决定性影响，同以色列的战略一致，对南部非洲的“建设性介入”……1985年，美国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恢复关系时，力量对比对美国有利。罗纳德·里根在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可以以为促成了莫斯科的衰弱而自夸。他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和平的世界——苏联从阿富汗撤退，两伊冲突和西南非洲冲突实现停火。

今后，在美国政治阶层的核心，是否会出现一种使伍德罗·威尔逊的后来者和尼克松—基辛格时代实际上的遗产继承人相互接近的共同的国际观念呢？其实在威尔逊式的“共同体”和基辛格式的“协调”这两种国际“方案”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可以发现，双方有着一种共同的意愿，即制定一种“和平结构”，以阻止主权政治实体间出于本能而存在着的弱肉强食状况。可以看出，双方对强迫各国接受某种行为准则有着同样的要求：那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即接受一种相对的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国际秩序，而寻求绝对安全则会导致单方面的外交，引起战败国的领土收复主义。诚然，威尔逊模式意味着把国内宪政机制应用到国际领域和

建立一种国际民主，而基辛格模式则使人想起十九世纪的贵族政治社会。但是，这两种和平构架的不相容不是绝对的。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还只是考虑恢复大国协调，即扩大了欧洲协调（以维护西方在当时尚未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的至上权力）。而基辛格所看重的二十世纪贵族政治社会，已不复是十九世纪的模样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进入大国协调，表明了体制的异质性，并排除了出现神圣同盟现象的可能。尤其是，从今以后在美国——也在西方——出现的就人权问题开展跨国行动的一致意见，使人们依稀看到一种离威尔逊所希望的国际法状态相去不远的国际人权趋于一致的前景。

从 1917 年起，威尔逊曾对俄国革命引起的国际体系的大破裂表示担忧。七十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代表着对十月革命以来列宁主义信条的第一次意义重大的修正：各国是相互依存的，一种“世界政策”应当取代各国的外交政策。国际体系在超越了 1917 年的大破裂后，重又成为均质的了。

1989—1991 年发生的事件加速了欧洲所确立的秩序的解体。乔治·布什在其 1990 年 1 月 31 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指出了这一点：“历史有着特殊

的时刻，有些日期将以前的一切同以后的一切区分开来。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是在 1945 年确定其基本轮廓的世界上度过的。这一年的事变决定了民族的形式，进步的速度，以及地球上成千上万人的自由或遭受压迫……1945 年为我们提供了战后共同的参照范围和基准点，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来理解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直至今日为止。因为刚刚过去的一年发生的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和如此惊人的变化，从而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如同在 1920 年和 1945 年那样，国际社会又需加以重建——但是这一次，一种“战后”局势结束了一场没有发生的世界大战。1991 年海湾危机表明并加速了正在发生的变化。面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野蛮侵略，大国一致予以谴责。1990 年 11 月 19 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和美国已不再是敌人，而是伙伴，并预言将出现一种“更可靠、更文明的世界秩序，它不是建立在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平等的对话、利益的均衡以及主权与人类完整性的和谐的基础之上”。1991 年 1 月 16 日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向议会的致词中，欢呼出现了“建立一种以人民自治权的共同法律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可能”。而正是乔治·布什在

他 1991 年 1 月 29 日的‘国情咨文’中谈及正在进行的战争后，本能地提出了“世界新秩序”这一如此典型的威尔逊主义的概念：“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国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即世界新秩序，在这种秩序里，各国都集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以实现人类普遍的愿望——和平、安全、自由和公理至上。”³

冷战结束，建立以大国合作和联合国机制为基础的‘新秩序’。海湾危机既反映了对‘欧洲协调’的回复，又反映了集体安全体系的复兴。但仍存在马塞尔·梅尔勒强调的两个问题：联合国的复苏是现实还是转瞬即逝的幻觉？对“新秩序”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抑或只是一个掩饰各自国家利益的方便的口号？

第二章 从东西冲突到 南北冲突

让我们对第三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状况拍摄三张照片。它们摄于当代历史的三个转折期。它们构成了分析南北关系性质的三个出发点：

——1955 年，第三国家的首次聚会 在万隆举行 非殖民化 提出政治要求。

——1974 年，在联合国里占多数的第 三世界提出“ 新经济秩序 ”的口号。向一个 扩大到世界范围的福利国家提出经济要求。

——1991 年，组成反对伊拉克动乱分子的国际联盟，南北关系重组，从西到东，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联成一体 的工业化北方与世界边缘地区各国人民之间酝酿着潜在的冲突。

1955 年 万隆会议

对万隆会议不乏热情奔放的评价。莱奥波德·

赛达尔·桑戈尔称之为“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事件”，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称之为“人类被蔑视者、被辱骂者、被剥夺者、被压迫者的集会”；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过去荷兰殖民者的夏日休假地）召开的亚非会议，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无可否认的转折。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是五个亚洲国家——缅甸、锡兰（后来的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总理。非洲和亚洲24个国家的政府派代表与会。这第三世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之所以召开，有着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理由：对印度支那战争继续和对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忧；为中国走上亚洲舞台提供便利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还有一个为所有与会国所共有的基本理由：即要显示出“富国”似乎尚未意识到的它们的独立。

也是在1955年，流亡埃及的阿尔及利亚人马莱克·贝纳比，提出了他的亚非主义理论。他注意到，非洲和亚洲人民已经摘下了十九世纪强加给他们的土著人的匿名面具。从此以后，可以看出存在着两条地缘政治轴线：“以大国心理确定的华盛顿—莫斯科轴线，和表现为生存意识的丹吉尔—雅加达轴线”。亚非各国人民应当团结成一股力量，加速非殖民化，并消除他们与“生活在华盛顿—莫斯科轴线”上的各

国人民之间的社会、文化、经济差距。

这是否意味着要建立相对于东方和西方集团的第三个集团呢？在贝纳比的心目中，亚非主义的雄心更为远大：那就是要“帮助不发达国家克服它们的不发达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帮助它们战胜由于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困难”，同时也是要“帮助超发达国家超越它们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帮助它们战胜由于强大而带来的危险”。因此，亚非主义包含着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它可能帮助人类超越力量对比关系

在这一点上，失败接踵而来。1956年当苏联坦克在匈牙利进行干涉时，万隆原则的精神便遭到了背叛。笔者至今还记得当时阿尔贝·加缪⁽²⁾对此提出的批评，他在《明日》周刊中唉叹面对布达佩斯悲剧，年轻国家表现出的消极状态。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这是亚非主义的两个倡导国之间的冲突，万隆原则精神再次遭到违背。在这两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都拒绝作出任何价值评判；这样，它们便表明，它们的行为与上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国家并无不同。这就有些像让·阿努伊⁽³⁾的剧本《山洞》中的一位人物，一旦变成大人，他也学会了大人的玩世不恭。

实际上，亚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神话：即亚

非两大洲的人民在漫长的殖民主义黑夜结束后相逢在一起的神话。历史却被证明不是那么光彩夺目，各国开始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差异，而且利益冲突也开始上升。

结论是否一团漆黑呢？印度记者简森承认，亚非运动具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作用：“它的益处在于把一大批新兴国家集中在一个保护圈里，使它们有时间学习对外政策和外交技巧，然后再去行使它们独立的选择权利。对于那些新生国家，世界因此而变得不那么充满敌意，不那么令人感到孤单了。”

1955 年还出现了一个纯粹地缘政治方面的基本因素：苏联在东地中海站住脚跟，以及苏联同第三世界在默契中结成联盟。苏联重返地中海——这是 1955 年 4 月 16 日苏联外交政策宣言予以宣布，并在五个月后因纳赛尔披露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武器供应合同而得到具体化的——首先应归因于两个国家的意图不谋而合：由于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形成而感到孤立的埃及想寻找新的联盟；苏联领导人拒绝继续接受西方对地中海的垄断。但这也反映了国际舞台上的重大变动：万隆会议打开了埃及同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的道路；纳赛尔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发现，社会主义世界可以帮助他确立其中立主义。于是，在世界政治的南北轴和东西轴之间便建立起

了联系。

二 1974 年 新经济秩序

从万隆会议到要求建立新经济秩序，第三世界领导人所走过的历程很能说明问题：与殖民主义的共同经历相重叠的，是贫困的经历；与避免任何新的依附的政治意愿相衔接的，是“无产者民族”的阶级团结。诚然，发展经济是今后第一位的目标，但是西方工业化世界的“保守”观点——不发达被归因于资本和技术的缺乏，而发达国家的援助将可能弥补这种缺乏——遭到摒弃，而关于剥削的“激进”言辞赢得了赞同。“中心地区”的扩展是建立在以贸易、恶化交换条件和向国外投资为手段对“周边地区”进行的剥削之上的。这样，从关于剥削的理论中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它使第三世界联合的最初的感情基础具有了某种合理的背景。

尽管各国利益和处境有着客观的分歧，整个第三世界仍形成了共同的阵线：石油危机一方面扩大了世界新的“中产阶级”——重要原料生产国和具有竞争性工业部类的年轻国家——同由真正贫穷的国家组成的“第四世界”之间的鸿沟，一方面却使“南方”所有国家感到拥有了一种真正的权力。这个共同

阵线是面对整个工业化世界的：虽然关于剥削的理论借用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扩张的观点，但这种理论也针对着东方国家，它们同西方国家一样，以世界市场价格作为同第三世界贸易关系的基础。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区别起了变化：第三世界国家珍视其主权，在国外投资和确定贸易条件方面，它们希望自己的主权是无限的；然而，它们又似乎很自然地干涉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无论是禁止消费国的防卫性联盟——这种联盟被宣布为不正当的，还是要求进行技术转让。在第三世界的理论家看来，要在一个扩大到全球的福利国家的范围内克服结构性的不平等，这种法律上的不公平待遇是必要的。1974年5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实际上也是在呼吁这个全球福利国家采取行动，并呼吁在国际范围内推行一种收入政策。这次会议在“全球第三等级”的倡导下，要求建立一种减少南北经济不平衡的“新秩序”：“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在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世界人口的7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收入只占世界总收入的30%。”

从1974年起，可以设想出三种可能的前景：

——复兴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南方”国家想进入发达国家的工业市场，这就意味着接受某种自

由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它们想获得技术转让，这就将把工业国的生产和消费标准引入它们的社会；它们必须得到粮食供应的保障，这就迫使它们给予发达国家以某种补偿。

因此，要建立自由主义的新经济秩序，就必须把主要原料生产国，即所谓“有用的第三世界”纳入西方金融和贸易流通渠道，以此“中和”第三世界提出的要求。从技术效益看：自由贸易作为国际交换的核心原则，可使革新迅速传播开来，并形成一种对大家都有益的竞争；“为了避免有损于大家的浪费，比较利益仍应是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基本因素”（马尔克·德·布里尚博语）。从政治灵活性看：为消除不平衡因素而采取的程序和机制或可使国家主权不受损害，因而相对说来容易为人所接受。

——通过制订国际计划集体管理资源。这第二种可能的前景意味着对世界经济结构本身采取行动：在第三世界最激进的领袖们看来，其目的是要确保对全球资源更公平的分配和保证贫穷国家起码的生存需要。意志主义的机制将取代自由主义的规则：对原料价格实行指数化；重建与美元本位“脱钩”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粮食供应提供保障；扩大有计划的国家间贸易。

在跨国的经济和社会斗争的背景下，出现了一